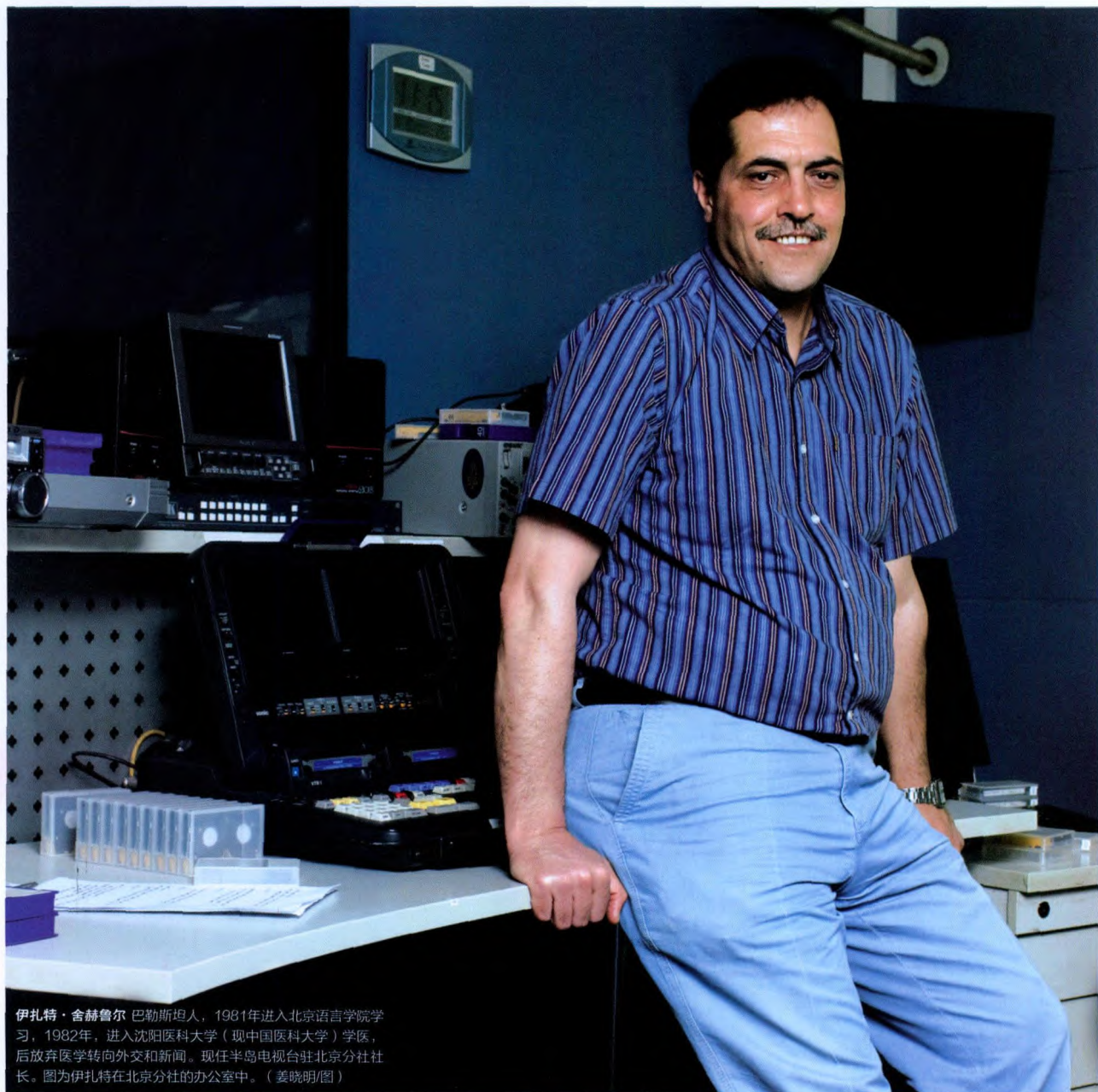


伊扎特：远在中国也在所不惜

口述|伊扎特·舍赫鲁尔 文|潘晶

先知穆罕默德说过一句话：为求知，即使远在中国也在所不惜。我从没想到这句话会成为概括我人生轨迹最恰当的描述。



伊扎特·舍赫鲁尔 巴勒斯坦人，1981年进入北京语言学院学习，1982年，进入沈阳医科大学（现中国医科大学）学医，后放弃医学转向外交和新闻。现任半岛电视台驻北京分社社长。图为伊扎特在北京分社的办公室中。（姜晓明/图）

我的童年是在叙利亚巴勒斯坦难民营中度过的，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所开设的学校接受了早期的教育。作为难民，巴勒斯坦孩子在就业上举步维艰，因此我索性报名参加了一个陌生国家大使馆举办的招生考试。这个国家就是我后来花了30年时间去认识的中国。根据中国 and 巴解组织签署的协议，这个留学的项目是免费的，因为成绩较为突出，我顺利地获得了前往中国的奖学金。

那时的北京睡得很早

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这在阿拉伯世界确实很少见，所以让我一个人去这么远的地方求学，家里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亲戚和邻居大多是反对的。我生活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巴勒斯坦难民家庭，尽管它只是近50万流亡叙利亚的巴勒斯坦人当中的一个小单位，却有着极大的代表性。在这里，几乎所有人来的时候都是一贫如洗，他们失去了全部，但绝不会再让孩子失去受教育的权利，也正是因此，巴勒斯坦人的受教育水平是整个阿拉伯世界当中最高的。我能感觉到父母对我的期望，所以我收拾行李，毅然来到了中国。从此，北京五道口的大街上就多了一个伊扎特。

和我一批来中国的四个巴勒斯坦留学生，一下飞机就同我一样感受到了北京的寒冷。生活方式、饮食和复杂的语言让我们很难适应，情急之下只想回家不上了。12月的五道口，放眼望去只能看见高耸的“煤山”和“白菜山”。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们慢慢地结识了使馆的同胞和以前的老同学，这才让我的心踏实了下来。

来之前，我跟父母说，只要条件允许，学校一放假我就回家看望他们。然而这一别就是17年，17年中，因为叙利亚政府与巴



1983年，伊扎特在桂林。

解组织的关系恶化，我们被禁止回国，只能通过写信以及极少的电话与家人联系。后来的时间里，我也很少能陪在父母身边，几年前母亲过世，或许也与日夜对儿子的思念有关。

1980年代初的北京，是我在中国的最初记忆。那时在北京睡得很早，没有夜生活，我们留学生的经济有限，就一直在宿舍消磨着时间。当时在中国的同学里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在夜晚的漆黑中看到有留学生宿舍亮着灯，要么是非洲学生喝酒听音乐，要么是东南亚学生在埋头看书，再有可能就是阿拉伯学生在谈论政事。

这句话确实不无道理，特别是对于阿拉伯学生的描述。一直以来，在政治高压下的阿拉伯各国，私下场合讨论政治如同家常便饭。但在公开场合讨论这些很容易给自己惹上杀身之祸，因此人们只能用笑话来表达对当政者的不满。阿拉伯人通用的一种打招呼方式是“你听了最新的笑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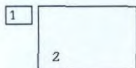
吗？”这就如同中国人见面问候“吃饭了没”一样平常。

我刚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并不说阿拉伯语，而是完全用中文授课。大概由于风俗习惯不同，中国人和阿拉伯人指自己的时候手势也不一样。每次老师说到“我”时，老拿手指鼻子，而我们则通常会指向胸口。后来换了一个会说阿拉伯语的老师来给我们讲课，刚开始先带着我们复习之前学过的内容。当他指着鼻子问底下的学生“什么叫我”时，有一个学生马上回答说是“鼻子”，弄得大伙哈哈大笑。

沈阳的冬天

完成北京语言大学一年的语言课程后，我被分配到了沈阳“那疙瘩”，我在中国的学医之路也就从沈阳医科大学（现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开始。

那时候在阿拉伯世界，医生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任何一个年轻人哪怕是小朋友，都梦



【1】伊扎特的毕业证书。
【2】图为伊扎特（后排右四）大学时期参加学校的足球队时，在比赛期间的合影。



想成为医生。我并不是很向往做一名医生，而是希望学文学，因为在叙利亚的时候就看过一些中国作家的著作，比如巴金和鲁迅，巴勒斯坦作家Ghassan Kanafani也对我的思想与性格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我父母比较倾向我学医，学成之后可以回去缓解难民营缺乏医学能人的窘境，再三商量之后，我最终顺从了父母的想法。

我已经记不清我是第二批还是第三批被派到沈阳的外国留学生，但我记得初到沈阳时，很多当地的老百姓没见过老外，无论是逛街还是到商场，我们总会被围观，甚至还有百姓把孩子架到肩膀上，对我们投来奇异的目光。这让从小到大的在叙利亚小城市长大的我感到很不舒服，感觉自己就像动物园里供人参观的猴子一样。但我还是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生活，并且乐于和街上的老百姓打交道，至今这段经历仍令我难以忘怀。

那时候自由市场作为一种新鲜事物刚刚出

现，人们终于可以不通过票据自由地买到需要的商品。好几次我去市场买蔬菜，卖菜的农村妇女说什么都不肯收我的钱，她说，你们远道而来，我怎么能收你们的钱呢？

沈阳的冬天很冷，让初到这里的我感到很不适应。冬天的清晨，我窝在宿舍不想去上课，辅导员担心我生病，便关切地跑来看我。他就像我远在中国的亲人一样，还经常摸摸我的大腿提醒我要穿秋裤。

1980年代初的中国对于留学生的活动有颇多限制，不希望我们和中国的百姓有太多太深的接触。比如，每年中国政府部门在面向留学生的大会上会告诫我们说，为了我们的安全，不允许我们去当地人家里。然而随着相处日久，我们已和老师同学们逐渐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每逢过节或是家里举办婚礼时，当地同学和老师们还是会“偷偷摸摸”地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每次我都会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把帽子压得低低的，“偷

偷摸摸”地骑着自行车前往赴约，所幸一次也没被逮住。到了朋友家以后，他们的父母亲对待我们就像对待他们自己的孩子，向我们嘘寒问暖，觉得我们这些外国学生在异国他乡生活很不容易。有时还会带他们家乡的特产给我们。其实那时政府也会安排留学生去当地人家里做客，但那些都是提前安排好的，并不真实。

这些事让我至今难忘，在那段作为离乡游子最初的日子里，沈阳的热情融化了严冬的寒冰。一直到现在，中国对我来说，不仅仅是我读书的地方，我生活的地方，我四个孩子出生的地方，她有着比我的实际经历更加重要的意义。

报道一个复杂的中国

当我在中国医科大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我本欲按照最初的设想当一名医生，但当我收拾行李准备回国时，却被告知，因特殊政治原因，我不能再回叙利亚。这

对我犹如当头一棒。而命运转折也恰在这时发生。

在沈阳读书期间，我曾与巴勒斯坦驻朝使馆外交人员有过接触。当他们见我无法回国又没找到工作，就建议我去朝鲜，我便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到朝鲜之后，我开始学习中医。由于课程不多，我经常去使馆帮忙，代笔撰写报告和其他稿件，在这期间，我写过几篇关于鲁迅的文章，发表在阿拉伯报纸上。在中国的作家中，鲁迅对我的影响很深，他讲述的一些故事和观点，非常贴近巴勒斯坦人民的现状和苦难，很容易在思想上激起巴勒斯坦人的共鸣。

没多久，我就被邀请留在使馆工作，专门负责新闻业务，成了一名正式的外交官。在朝鲜和老挝当了多年外交官之后，我于1992年被派回北京巴勒斯坦大使馆，工作10年，职务均是管理新闻的文化参赞。这段时间新闻和媒体成了我每天打交道的事务，媒介的巨大影响力吸引我成为其中的一员。

2002年正值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成立，我也加入了应聘者的行列，并最终成为“半岛”北京分社第一任社长。一方面，那个时候，半岛电视台已经成为阿拉伯甚至全世界非常有影响力的媒体。为这样一家机构工作你会感到你身上的使命是重要的，是向阿拉伯观众介绍中国，这些观众中有官员，有老百姓，而你的报道直接关系到民众的态度和国家的政策。

我也曾经就这个问题征询过我们的领导人，前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的意见，他说半岛电视台是一家非常有影响力的媒体，希望有更多的巴勒斯坦青年能够去那里工作。这席话也坚定了我转行做新闻的决心。

此前，西方媒体报道中国，就如同中国媒体报道西方一样，永远都是转述第三方的语境，别人预设的立场就像哈哈镜，让你看不清对方到底是什么样子。而阿拉伯媒体会把关注点放在中国的各个方面。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可能因为一些历史的因素和文化上的对抗，很自然地互相要做的报道是鸡蛋里挑骨头，但是中国和阿拉伯世界没有这些外部因素。我们希望能用阿拉伯的眼睛观察中国。

虽说现在“半岛”在中国已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但其最初在中国的起步可谓步履蹒跚。之前很多中国媒体的宣传让老百姓产生了一种误解，认为“半岛”就是基地组织和本·拉登的传声筒。这种误会很容易理解，由于语言和习惯上的原因，他们也是通过第三方去了解我们，不会去全面地评估我们的报道，并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去联系采访对象的时候，对方常常直接拒绝我们，可能是怕跟恐怖组织有牵连吧。也有人问我们是哪个半岛，朝鲜还是山东？当然，这个阶段大约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到了伊拉克战争之后，中国人对半岛电视台的了解就逐渐多了，不再仅仅局限于本·拉登的层面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工作可以说就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障碍逐渐消除。中国人开始对“半岛”进行深入了解，意识到了它在国际新闻平台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显而易见，它提供了西方媒体新闻语境外的另一种选择，也正是因此，中国官方开始重视在“半岛”发声。

那段时间“半岛”在业务上作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突破，比如我们都知道以前中国官员没有在国外媒体的直播节目中亮相的

习惯，而我们成功地对一些中国高官进行了一对一的直播采访，这其中包括当时的外交部长唐家璇、副外长翟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等等。

第三个阶段，可以说是逆向体现的，半岛电视台对于中国的重视程度提高了，所以北京分社得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2006年夏天，半岛电视台第一次用一周的时间对一个国家进行全天候的重点报道，也就是“聚焦中国”。我们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也对这个报道的必要性做了客观的评估：对于阿拉伯世界来说，中国是一片神秘而又不能不了解的土地，十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让阿拉伯人难以拒绝纷至沓来的中国人和中国商品，电视新闻里有关中国的报道也在不断增多。

随着在工作中对于中国社会了解的不断深入，我们也逐渐去挖掘每一个社会现象当中的故事，接触每一个老百姓，试图把文化融入每个报道当中，所以我们开始对之前报道过的现象进行再剖析，对中国的报道更深入了。简而言之，从前我们是横向了解中国，现在则是纵向品读中国。

记得我刚来中国的时候，人们穿着同样颜色、同样款式的衣服，用着同样的交通工具。3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变革，与此同时，在所有的领域上，中国人的矛盾加深了。原来大家的想法和思维方式都差不多，但现在每一个人都有了自己的想法，思考问题的方式，对思想的禁锢松动了。以前，无论是做报道还是作分析的时候对中国人心态的揣摩都比现在要简单得多，可现在你很难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开放、城市和农村、穷人和富人，现在在我所要报道的是一个复杂的中国。□